

本書獲2000年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以及2000年世界歷史學會年度獎

# 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Kenneth Pomeranz (彭慕蘭) 著  
邱澎生 等譯

# 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 世界經濟的形成

Kenneth Pomeranz (彭慕蘭) 著

邱澎生等 譯

國立編譯館 主譯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4 Chu Liu Book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書中文翻譯著作財產權為國立編譯館所有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彭慕蘭

(Kenneth Pomeranz) 著；邱澎生等合譯。-- 初版。

-- 臺北市：巨流，2004〔民93〕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譯自：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ISBN 957-732-205-0 (平裝)

1. 國際經濟 2. 經濟發展-歷史

552.1

93008126

## 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

原著：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原著者：Kenneth Pomeranz (彭慕蘭)

出版者：巨流圖書公司

創辦人：熊嶺

總編輯：陳巨擘

主譯者：國立編譯館

譯者：邱澎生等

封面設計：鄭宇翔

地址：106 台北市溫州街48巷5號1樓

電話：(02) 23695250 · 23695680

傳真：(02) 83691393

郵購：郵政劃撥帳號 01002323

e-mail: 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總經銷：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5號

電話：(07) 2261273

傳真：(07) 2264697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45號

ISBN: 957-732-205-0

2004年6月初版一刷

定價50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 作者簡介：

彭慕蘭 (Kenneth Pomeranz)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歷史系主任，歷史和東亞語言文學教授。他所著的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一書獲美國歷史學會 1994 年東亞史最佳著作費正清獎、《大分流》獲 2000 年費正清獎以及 2000 年世界歷史學會年度獎。

## 介紹人簡介：

郭慧英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 譯者簡介：

呂紹理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博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巫仁恕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助理研究員。

林美莉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助理研究員。

邱澎生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與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張寧

英國劍橋大學歷史學系博士，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助理研究員。

連玲玲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歷史研究所博士，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助理研究員。

陳巨擘

巨流圖書公司總編輯。

楊淑嬌

奧勒岡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主修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曾任職台北市新聞處、編輯、記者、讀者文摘中文版台灣特撰稿，現為自由文字工作者。

劉士永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理研究員。

## 《大分流》簡介\*

郭慧英 撰

從多元比較的觀點來處理東、西方近世發展的律則，是近年來中國史、近世世界史研究和發展社會學（特別是其中的世界體系理論學派）的熱門話題之一。自 1997 年起，先有歷史學家王國斌（R. Bin Wong）從資本主義和國家形成的角度，比較歐洲和中國自第十二世紀以來的發展軌跡。<sup>1</sup>繼之有依賴理論的提倡者 Andre Gunder Frank 推出 *ReOrient* 一書，修正自 1970 年代以來發展理論的觀點（也是 Frank 本人過去的主張），重新詮釋十六到十八世紀世界經濟的發展，認為是歐洲人對亞洲絲織品的需求，而非為攫取廉價原料與勞工，驅動了歐洲人向美洲新大陸的擴張以及歐、亞海上貿易的建立。<sup>2</sup>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以下簡稱「本書」）則探討何以歐、亞兩方在經歷這三百年之間相似的發展歷程之後，歐洲經濟會在十九世紀之後超越亞洲？在這些同樣以改寫「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為企圖的鉅觀比較研究裡，本書以年鑑學派大師布勞岱（Fernand Braudel）的理論架構為張本，融合了 Frank 對全球商品流通的強調和王國斌對國家形成（state making）的關懷，詳細分析這些全球與區域發展對各個地域生態結構的不同影響。正是其在鉅觀的、長時段比較研究上，兼具對區域性生態資源與社會發展的細釋，使得本書甫一出版，即獲得廣泛的注意及討論。<sup>3</sup>

本文首先介紹本書的主要論證；其次將這些論證放在當前檢討「歐洲中心」世界史觀的研究脈絡中，突顯出其在比較方法上的突破。

## 一、

本書的分析單位建立在布勞岱對近世世界文明與經濟發展的架構上。在探討十五到十八世紀的文明與資本主義的三套鉅著中，布勞岱將不同的經濟單位——例如地中海經濟、中國經濟、印度經濟等——定義為一個個的「世界經濟體」(a world-economy)。<sup>4</sup> 在單一的資本主義全球市場興起之前，長程貿易及其所引進的奢侈品消費將各個獨立的「世界經濟體」連結起來。而每個「世界經濟體」乃由下列三個層次所構成：最基礎的「物質生活」(material life)；地域性的「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以及國家與市場互動的結果。在第三個層次上，彭氏修正了布勞岱的觀點。布勞岱強調「資本主義」(capitalism)如何在歐洲全國性市場的建立、經濟擴張的歷史機遇(historical conjuncture)下形成；而本書則主張，在十六到十八世紀這三百年的世界經濟中，歐、亞的經濟發展呈現諸多雷同之處——包括農業與科技、地域性市場活動、上層社會的奢侈品消費，甚至是政治勢力規約經濟活動的模式。然而，由於歐洲人擁有美洲新大陸作為腹地，歐、亞兩方在十九世紀之後的發展因而產生了大分歧：美洲資源對歐洲生態壓力的疏解，使得歐洲在十九世紀之後有突破性的經濟成長與社會發展。

為了要證明這些觀點，彭氏必須要反駁那些認為東、西方發

展的歧異是源於內在差別的研究典範。

首先，在物質生活的層次，他從東、西方在農業技術和土地財產制度的差別的討論切入。研究近世歐洲經濟成長的學者 Eric Johns 曾以歐洲在耕種上使用較多的獸力而推論出歐洲在農業生產上的優越。但彭氏卻指出，雖然中國農耕所依賴的動物並不多，但以作物性質和歐洲相近的華北而言，華北土地肥力較高，從而抵消了需要透過大量獸力來深耕的必要性；至於華南米作區的產量高低則取決於投入大量人力的精耕，而不是大量獸力的耕作（第一章）。在經濟制度與歐洲興起的議題上，Douglas North 和 Robert Paul Thomas 曾以西歐（特別是英國）對於財產制度和創新發明的獎勵來論證其在十六世紀以降高度的經濟成長；彭氏則以西歐土地承租權世襲問題所導致的土地合併的困難和水利開發的限制（特別是法國），來反駁歐洲的經濟制度會比中國來得有效率。他並指出在租約保障下，中國的佃農會投入農業生產的改善；至於耕種者不願改善農地的現象，則是土地買賣的商業化所致，而不是中國習慣法（customary law）制度的限制。（頁 70-3）彭氏更修正了黃宗智（Philip C. C. Huang）以「內捲性成長」（involutionary development）來描繪中國經濟發展的特色與限制。該概念點出在中國以家戶（household）作為生產單位的前提下，因單位勞動人口不斷增加但可耕地有限而導致邊際效益遞減的現象；彭氏卻認為這個概念同樣可以用來解釋歐洲的發展（第二章）。

其次，關於市場經濟的討論，彭慕蘭重新詮釋 Sydney Mintz 對蔗糖消費與工業發展的命題。<sup>5</sup> 雖然 Mintz 並沒有直接探討中國的糖消費，但其命題卻為 Sucheta Mazumdar 巧妙地帶進對中國明清商業發展與工業化研究的問題意識裡：為何高度發展的糖



消費並沒有進一步推動工業化？她的研究發現，中國糖產地（福建、廣東和台灣）小規模的家戶生產限制了進一步商業化和生產技術與規模的改良。彭氏則對此提出不同的看法：其一，如果 Mintz 對於咖啡、可可、菸草等商品的重視，在於它們提供了工業革命之後普羅大眾所需的提神飲料，那麼同樣含有咖啡因的茶，也應放在同等的地位去討論；他援用大陸學者吳承明對十九世紀中國國內市場的研究，指出中國茶的流通遠高於歐洲，而菸草的消費更令十八世紀派來中國視察的英國特使歎為觀止（頁 119-20）；其二，Mintz 主要探討英國砂糖消費的普及化，而彭氏推估，清季中國整體的砂糖消費較歐洲整體高，並且比歐洲任何一個地方更接近英國的每人平均砂糖消費量。至於十九世紀中期之後中國砂糖消費量的減少，則可以從主要消費區域人口減少的角度去解釋：嶺南、東南沿海和長江下游三區在十八世紀中葉占全國百分之四十的人口，可能消費了當時中國所有的砂糖（除了首都一帶的消費之外）；而在一個世紀之後，由於人口向邊陲地區移動並成長，這三個富庶區域的人口只剩下全中國人口的四分之一，富庶地區人口的相對減少從而反映在這些區域砂糖的消費量的減少上（第三章）。

最後，關於政治對於市場規約的討論，彭慕蘭比較歐洲與中國的政治勢力對於大規模商業活動的制度化（包括全國性市場的形成、長程貿易和信用制度）的影響。他修正布勞岱的主張，認為只有在歐洲，國家勢力才能有效地整合全國性的市場、長程貿易和財政稅收；他認為，中國和印度民間都有活絡的資金、信貸的流通，資助長程貿易的進行，而在沒有國家軍事的保護下，亞洲商人的表現並不輸給歐洲由重商政策所支持的商人。另一方面，就 Charles Tilly 和王國斌認為歐洲十六世紀以降的戰爭有助

於建立國家稅收和財政制度的觀點，彭氏則認為戰爭未必有效地消滅舊有的經濟特權階層，全國性財稅制度的出現也不是決定歐洲經濟超越亞洲的關鍵因素（第四章）。

在列舉歐亞之間諸多相似的發展化後，本書第三部份則分析造成東、西方發展在十九世紀之後產生紛歧的原因。彭氏延續 G. William Skinner 將中國依內部各地不同的生態地理結構劃分成幾個不同的大區域（macroregion）——例如作為核心地區的長江下游、嶺南和東南沿海，以及邊陲地帶的廣西和長江下游等——而與歐洲大陸內部相對應的區域相互對照、比較。他指出在中國與歐洲的經濟核心地帶，從十六到十八世紀皆面對因人口成長所致的資源與生態壓力（第五章）。在中國，國家因應之道是鼓勵各區域之間的均衡發展，用各種政策像是官方對米價的介入、以及將工業傳布到邊陲地區的方針等，促成中國在十八世紀人口從擁擠的核心地區朝向人、地比例較為稀疏的邊陲地區流動的趨勢；相反的，在歐洲，由於東歐與西歐之間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特別是易北河以東的強制勞動和領主專制——西歐的自由民並沒有大規模移民東歐、尋找可耕地的現象。當中國的生態壓力隨著人口流動而由核心擴散到邊陲地區時，西歐的困境又是如何疏解呢？這裡來到了論證的第二部份。他認為，歐洲之所以能夠在十九世紀初期突破這個壓力，是由於：一，煤礦的供應與歐洲核心工業地區在地緣上的相近——反之中國的工業中心與礦源所在地之間相距遙迢；二，十八世紀之後，美洲大陸被開發成歐洲經濟的新邊陲（new periphery）。因此，歐洲可以在內部就近發展工業化、並且運用美洲資源而超越亞洲的發展（第六章）。

本書在正文闡明其立論，並另闢六個附錄來說明其比較的單

位和其數據的推算。附錄 A 是德國和北印度在十九世紀前後陸路運輸的年承載總量；附錄 B 是十八世紀末中國華北和英國（同樣為麥作區）的施肥程度和氮肥消耗；附錄 C 比較法國、中國的嶺南和華北部份地區森林覆蓋的面積和能源供給的估計；附錄 D 推估英國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從外地進口糖、木材和棉花而節省了多少英國本土土地的利用；附錄 E 估計十七零到 1840 年之間長江下游鄉村紡織工人的產值；附錄 F 比較中國（特別是長江下游）和英國、法國和德國在十八世紀中葉以降的綿、絲生產。附錄裡這些數據的推估正是正文裡頭用比較論述的基礎。同時這些附錄呈現了作者的研究假設——像是比較的單位與指標——以及其具體的操作過程。作者廣泛涉獵歐洲和中國經濟史的權威著作，重新整理各個重要專題研究的資料與論證，統整出比較分析的指標。以中國的討論為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資料包括（但不限於）華北方面：根據黃宗智及彭氏之前根據滿鐵調查資料所作的研究，佐以 Dwight Perkins 對中國農業研究的整體分析；嶺南方面則參考 Robert Marks 對於生態的討論、蘇耀昌（Alvin Y. So）的絲生產和 Mazumdar 的糖生產與消費；長江下游部分則以王業鍵的物價分析、李伯重的原初工業化，以及趙岡的人口研究和城鎮發展為基礎，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資料是根據既有區域研究的文獻，再次整理與推估出來的，已有學者質疑其參考價值，讀者在徵引書中研究數據時或需加以斟酌。<sup>6</sup>

## 二、

縱橫中國明、清史與近代歐洲關於經濟、政治與社會發展的討論，彭慕蘭的著作系統地將東、西方近世發展的主要律則，放在鉅觀比較研究的經緯下加以比較。但本書的貢獻不僅於此。在當前反思「歐洲中心」近代世界史觀的研究中，本書在比較方法上走出了既有的、將各個區域視為互不相干的發展單位的科臼；並且在將近世歐、亞的發展歷程放諸於全球經濟的結構來分析之餘，又能夠跳脫出在 1960、70 年代 Frank 的依賴理論、Immanuel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單向地以西方的擴張作為分析視角。

事實上，Charles Tilly 曾將 Frank 早期的著作、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等鉅觀比較研究，歸納為「涵括式比較方法」(encompassing comparison)。<sup>7</sup>而近二十年來對歐洲中心主義近代史觀的挑戰，也可以說是對 1970 年代發展理論在比較研究方法的反省：早期的理論多以西方經驗出發，從而解釋何以「世界上其它地方」(“the rest of the world”) 並無法相同地發展起來。這個研究架構的問題是，檢證的指標（例如「資本主義」、「現代性」或「民族國家」），往往是源自西方歷史經驗的產物，而同樣的商品化、工業化或國家政治結構重組的過程，在亞洲的發展脈絡裡，不見得可以完全用同樣的概念去衡量。

根據依賴理論、世界體系理論的共同主張，資本主義在十六世紀西歐興起之後向「世界上其它地方」擴張，並且透過軍事及武力等政治手段與後者進行不平等的經濟交換。作為該理論的倡導者，Frank 在 1960 年代末期所發表的依賴理論 (Dependency Theory)，以「中心」(metropolis) 和「衛星」(satellite) 的概

念，來思考何以拉丁美洲在成功地轉型為出口導向工業化經濟之後，並沒有如主流發展理論——例如 W. W. Rostow ——所預測地進入經濟全面躍升（take-off）的階段。他認為關鍵在於拉丁美洲與北美洲和西歐之間的經濟聯帶——特別是殖民經驗所殘留的分工關係——是一種不平等交換的結構。為了突破既有的發展限制，後進國必須自當前的國際分工體系裡「切斷」（de-link）。<sup>8</sup>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延伸 Frank 「中心—衛星」的概念，卻不同意 Frank 針對後進發展國家所開出的藥方。Wallerstein 認為，要在強國剝削弱國的資本主義分工體系之外另尋出路，應該是在全球經濟作為一單一分工體系的基礎上，建立一個以資源的利用（而非銷售）和生產成本（包括勞動及土地、原料等生態成本）為核心關懷的政府，來取代一味追求利潤的資本主義及附和於資本主義之下運作的跨國系統（inter-state system）。而他們對於行動策略的紛歧，反映出依賴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在分析單位上的不同：前者是個別的國家，後者則是以歐洲資本主義的擴張為主軸的現代世界體系。<sup>9</sup>

Wallerstein 的現代世界體系理論以資本主義在迄今五百年歷史裡的興起、擴張及自我調整，來勾勒當前世界不平等的結構：核心（core）對邊陲（periphery）國家在政治與經濟上的不平等關係，以及半邊陲（semi-periphery）國家在這一組組不平等關係之間的緩衝。在這個敘事下，在 1840 年代鴉片戰爭爆發之前的中國被視為是擴張中的世界體系的「外圍地帶」（external arena）；即使 Wallerstein 注意到中國廣泛地涉入十六到十八世紀之間歐、亞的海上貿易，但在他的眼中，那只是「奢侈品貿易」（luxury trade），「只有當歐洲沒有選擇，無法在自己世界經濟（its own world-economy）的範圍裡獲得這些產品的時候，它才會

用比較高的價格去向外面的地區購買。」<sup>10</sup>

而這個闡釋資本主義在歐洲興起、從而將世界上其它經濟體「整編」(incorporate)進該體系的敘事，在80年代即遇到挑戰。這個挑戰首先由人類學者 Eric Wolf 提出。在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一書，Wolf 指出這個整編的過程並不是由歐洲單向的壓迫和控制所決定；而從被整編者——他所謂「沒有歷史的人」(people without history)——的角度來理解，歐洲資本主義占絕對上風的關鍵時刻是工業革命的興起（他界定在十八世紀後半的英國），而不是十六世紀美洲大陸的「發現」。<sup>11</sup> 隨後，社會學者 Janet Abu-Lughod 在質疑「歐洲資本主義等於世界體系」的動機下，勾勒出另一個、不是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Abu-Lughod 認為十三世紀中葉到十四世紀中葉的世界體系是由三個大經濟圈、八個次系統所構成；與十六世紀以降的歐洲資本主義性質不同，不同經濟單位彼此之間鬆散地結合，並透過長程貿易的交換而均霑好處。<sup>12</sup> 從 Wolf 到 Abu-Lughod 的討論，掀起了1990年代之後對「歐洲中心」近代世界史觀的反省與討論。<sup>13</sup>

王國斌教授在1997年推出的 *China Transformed*，以中國史為本位重新檢證世界各區域的發展歷史的著作。王氏對於歐洲與中國在十八世紀之前歐洲工業革命以前在農業生產與商業化的相似程度的論證，啟發了彭氏書寫《大分流》的基礎。<sup>14</sup> 但不同於自依賴理論以來的理論關注，王氏的論證毋寧是採取內向性的(inward-looking)解釋而非對世界經濟流通的強調。他強調東、西方之間在十八世紀末期之間都經歷了相似的商業化和市場制度，但是由於不同的國家形成(state formation)，歐洲在十八世紀之後取得突破性的發展。主要論點是：歐洲長期以來因國與國

之間的衝突而發展出重稅、重商以及直接的社會控制；反之，中國相對穩定的政治結構使中國朝廷對社會的控制是有限且間接的：像是輕稅、由士紳階層來管理百姓、以及對生計像米倉系統（granary system）等的重視。這些政治規劃，使得中國的政治系統呈現「制度彈性的缺乏」（a lack of institutional flexibility）、無法刺激工業技術的革新。

當大多數的討論都是以西方發展為標竿來檢討東方（中國）的發展，王氏的著作成功地將中國帝國晚期的政治經濟發展注入西方近代社會變遷的討論中。然而，他把中國自帝國晚期一千多年來的社會定位為一大一統的農業帝國，卻無法回應近年來對中國自宋朝以降，特別是明、清之際沿海城市對世界經濟的參與與初始工業化的討論；同時，也有學者認為王氏並無法解釋何以不同的國家形成對刺激工業與商業技術革新的交易制度與環境有如此深遠的影響。<sup>15</sup>

Frank 在 1998 年問世的 *ReOrient*，則回到對全球商品流通的理論關懷，重新審視自十六到十八世紀的歐、亞發展。*ReOrient* 將這段時期重新詮釋為亞洲經濟的霸權時代。而亞洲之於歐洲經濟的優越性，在此以工業產品的供給來證明，特別是從中國出口的絲和印度的棉布。他尤其強調前者，因為大量的絲織品出口，使中國成為在全球市場流通的白銀的最後匯集之處。白銀是當時亞洲市場唯一有興趣的歐洲商品。Frank 表示：「透過加入亞洲區間貿易，歐洲人能夠從比他們更具生產力、更富裕的亞洲經濟裡獲得好處；他們之所以能夠進行亞洲區間貿易，就完全要歸諸於美洲白銀的貢獻。」（Frank 1998: 282）至於歐洲人又是如何發現這個如此重要的美洲呢？Frank 接受地理學家 Jim Blaut 的看法——歐洲人能夠在 1492 年到達美洲，是因為伊比利

半島和加勒比海在地理上的接近，而不是出於任何航海技術的優勢。<sup>16</sup>

這個「亞洲中心」近代世界史觀一經提出，立刻就衝擊到 Wallerstein 的現代世界理論，順帶也宣告 Frank 和自己早期思想的斷裂。如同 Frank 早期對「中心—衛星」國家之間不平等交換關係的詮釋，成功地成為新一波發展理論的學術典範；ReOrient 的討論也順利地將這個「歐洲中心」近代世界史觀的論辯推向一個新的高峰。站在 *ReOrient* 的高度來看，Wolf 的討論只強化了歐洲經濟史學者（如 Maurice Dobb 等人）對於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的區分，而沒有把那些「沒有歷史的人」重新放在全球經濟的角度去思考——Frank 對十六到十八世紀美洲白銀流通的分析則落實了這個企圖；至於 Abu-Lughod 對於「核心—邊陲」概念的重新詮釋，則被 Frank 進一步理論化為「水平整合的鉅觀歷史」（horizontal integrative macro-history），他並將這個理論應用在對十九世紀歐亞勢力大逆轉的討論裡，與 Wallerstein 的「收編」觀點正式交鋒。

進一步說明，Frank 提出「水平整合」的歷史觀以強調不同的經濟體在相同的全球經濟在康德拉季耶夫週期（Kondratieff Cycle）正的景氣升降：「核心」地區表示經濟循環的一時受惠者，反之則為「邊陲」；但處在「核心」也同時意味著當景氣由盛轉衰時受到比較大的打擊，也比較不能夠有效地調適，「邊陲」則趁勢取而代之。<sup>17</sup>相較於 Wallerstein 用 1757 年普拉西之役（The Plassey War）和 1840 年的鴉片戰爭來標示印度蒙戈爾帝國（Mughal Empire）和大清帝國被整編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歷史時刻，<sup>18</sup>Frank 則強調十八世紀末期的世界經濟進入景氣下滑的康德拉季耶夫 B 波段對於印度和中國的影響。簡言之，東方的



衰微先於西方的入侵。

Frank 的論證裡有一個很顯然地盲點。那就是，他無法解釋究竟歐洲與亞洲的經濟圈是互為影響的（如同他對十七世紀歐洲的經濟危機的解釋）；<sup>19</sup> 或者二者是同一個全球經濟週期上，平行的、互為獨立的經濟體（如同他對十九世紀歐、亞地位逆轉的解釋）。而這個理論上無法自圓其說之處，使得該書對近代世界史的改寫受到質疑。<sup>20</sup>

Frank 所留下的這個問題，正是近世世界發展史長期以來的辯論焦點；對此，彭慕蘭在本書提出了突破性創見來解決。過去的討論，包括 Frank 的 *ReOrient* 在內，往往停留在從流通的商品本身來分析十六到十八世紀歐、亞貿易的性質（例如，究竟中國的絲綢是否只是對歐洲社會發展無足輕重的奢侈品；美洲白銀是否只是單純的貨幣或者，如 Frank 所宣稱的，可以視為一種工業產品）。彭氏針對歐、亞的長程貿易對兩地內部生態與人口資源等的影響，提出了更為全面的檢證。他從美洲的資源來解釋何以歐洲（特別是英國）得以在十九世紀之後克服其生態限制、突破性地發展工業技術。同時，彭氏對地域性經濟單位的分析，將歐、亞的核心與核心區域、邊陲與邊陲區域相類比，也較籠統地以一帝國為範圍的考察（如王國斌的著作），提供更具說服力的觀點。因此，本書可以說是至今為止對「歐洲中心主義」近代社會發展觀點的反省所提出的最有力的挑戰。

### 註釋

- \* 本文為作者發表在《新史學》第十三卷第三期的書評〈「反」歐洲中心主義」世界體系論戰裡的中國與世界〉一文的延伸。作者感謝 Mark